

台灣著名文化人

龍應台：

我有記憶，所以我在



她在潮水般的掌聲中走上香港會展中心最大的那個可容納1600人的會議廳的演講台，開口講的第一句話，卻是對擠不進這個廳的另一間電視轉播廳內的上千名聽眾表示感謝。她是今年香港書展的絕對主角，從兩岸三地慕名而來聽她演講的聽眾有三千多人。她不是女明星，卻以思想之美，折服了兩岸三地一代又一代人。她的出場，永遠讓人感到剛柔並濟的力量。人們喜歡她，因為她是龍應台。

她將卸任台灣「文化部」部長後的首場演講，放在香港書展。她以自身對歷史的體悟與謙卑，鼓勵年輕人去嘗試「傾聽不喜歡的聲音」，並告訴我們「記憶」可以怎樣賦予人以尊嚴。理解別人的「記憶」、對岸的「記憶」，又何其重要。

今次我們從龍應台的2015書展演講中，精選出幾個精彩片段，與讀者共同分享，體味這位有情懷有擔當的著名作家對華人世界的動人省思。
正文內容節選自龍應台演講 攝：彭宇文



龍應台在書展為讀者簽書。

名家對談

問：您認為台灣與大陸的傾聽之門是否會更加開放？

龍：這是關乎政黨、政府政治的走向，但是我今天演講最主要的是談我們作為人民的時候，不管政治的力量怎樣，我們人民本身可以做的事情。

問：您反覆強調年輕一代去傾聽，是否因為擔心年輕一代會比老一輩更不重視「記憶」這件事？

龍：我有一種擔心，這種擔心尤其是凸顯在媒體，媒體本身不管還有多少人坐下來看電視新聞，但有種情況是當整個社會娛樂化的時候，比較深刻的開闊的新聞報道就不見了。不管是市場化還是娛樂化，都使得人民平時接觸到的新聞其實是扭曲的或者是片面的，或者是極度膚淺的——有時是市場的力量，有時是政治的力量，當這樣的情況持續，而我們的孩子一代一代長大，對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沒有足夠的自覺時，我會認為，一個社會走上危險的方向不是不可能的。我是有這個憂慮的。

問：您以前寫《香港筆記》，覺得香港是經濟導向的城市，不太尊重本土的文化，這幾年有無留意香港最新的改變？

龍：我當然有注意到，但我不會評論今天。大家都知道我過去三年應該說粉身碎骨都在為台灣的「文化部」工作忙碌，可能無法比較深入去了解香港和大陸發生的事情。很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很多細節你不清楚時，做任何評論都是非常不負責任的。所以我不能夠，要等到有機會再深入香港生活時才能回答。我需要一點做功課的時間。

問：《野火集》三十年紀念版中您寄語香港不只要勇敢更要有智慧，還要有耐心。怎麼看待港台現在的年輕人與社會間的矛盾？

龍：片面的回答是不好的。我只能回到自己所寫的，尤其是給香港的那篇序言，那個意思是說，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後，是不一樣的。

我自己三十三歲的時候，看到台灣的狀況而為那個時代那個狀態的台灣所寫下文章，在那個時候，台灣還是威權體制下的社會，民間的聲音是很容易出來的。所以那時候我們那代人，你要努力抵抗或處理的對象，跟三十年後的現在的對象本質上非常不一樣。

我那篇序的意思是，我們今天的年輕人，不但不是一個威權體制它可能老化了，連反對者都可能是過時了。因為你需要認識到整個情境跟結構的不同，要有新的結構跟新的方法。

所以那篇序是在鼓勵香港的九十後——如果以前比較需要勇敢，那麼今天不是一個沒人敢說話的時代。今天所需要的可能不是單純的勇敢，而是智謀跟知識本身。所以三十年前的年輕人跟今天年輕人面對的挑戰是不一樣的。

問：因為一些歷史原因，台灣、大陸跟香港年輕人對中華歷史的認知都不夠完整，三個地方都有一定的偏差缺失。港台現實中年輕人會有一些躁動，您覺得年輕人可以作出什麼努力？

龍：可以做的太多了，我今天演講的核心是從傾聽開始。

問：對香港書展的看法是？

龍：雖然大家對香港書展也有一些批評，但香港是個七百萬人的城市，香港書展真的是香港可以好好思考說，整個區域性中，香港可以如何利用自己的位置優勢，可以如何成為整個區域的書展中心。這個優勢是台灣沒有的，深圳和廣州也沒有的。香港該思考怎麼把書展真正變成文化上的power house？大有可為。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記憶，是功課

記憶，是情感的水庫。它可以把最惡劣的荒地灌溉成萬畝良田，也可以沖破道德的水壩毀山滅地，把良田變成萬人塚。在佛教裡，「功課」指的是必須靜思課誦的一種努力，我認為記憶是一門非常、非常困難的功課，需要深刻的思索，智慧的抉擇，需要我們竭盡努力地去面對，去處理。

2015年是越戰結束四十周年。1975年4月30日，北越的坦克車堂堂開進了西貢的總統府。一場戰爭造成幾百萬人死亡，幾百萬人流亡，四十年後，勝利者以盛大的閱兵和武器展示來慶祝這個日子，像一枚又重又大的官印威風凜凜地打在記憶的出生證明紙上。對勝利者固然是一種自我肯定自我表揚，可是對那三百萬被迫永別鄉土，記憶中永遠是殺戮和強暴的人而言，這個割得很深的傷口，沒有療癒的機會。而那已經慘死的、終生流亡的，和那勝利閱兵的人，其實彼此是「同胞」。

對記憶這門功課也有人選擇了不同的解題方法。今年是二戰結束七十周年。對歐美戰勝國這個日子容易，到戰士紀念碑前獻花致敬，帶小學生到古戰場巡禮……但是戰敗國呢？或者說，始作俑的侵略國怎麼面對呢？對於德國，1945年5月8日究竟是「戰敗日」還是「解放日」？蘇聯的坦克車轟轟駛進柏林的那一刻，究竟柏林是淪陷了，還是解放了？

說是「戰敗淪陷」，你是否就把自己和希特勒等同陣線了，但是你也許根本就不認同納粹或說很多人自己就是納粹的受害者。說是「勝利解放」，又怎麼解釋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一妻子女兒姊妹被勝利者拖出去強暴、平民被嘻笑的士兵射殺，百萬同胞的死亡、流離，整個城市的轟炸毀滅，以及其後的飢寒交迫和羞辱？

德國人在戰後有很長一段時間的「失語」，太難堪的記憶不忍、不敢拿到陽光下去看。但是「功課」逐步地做——1970年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的犧牲者紀念碑前下跪，1985年終戰四十周年時，魏茨澤克以德國總統的身份公開說，1945是德國的「解放」。



在2005年的普查中，35%的德國人認為1945是德國的「戰敗」，十年後的今天，只有9%有這樣的觀點，絕大多數人認為是「解放」。在做了七十年的功課之後，對於這痛苦記憶的處理方式是，德國總理默克爾飛到莫斯科去蘇聯戰士的墓前獻花。

我們真的認識自己的「同胞」嗎？

我不知道「愛國」是什麼意思，因為「國」是抽象的，不抽象、可以愛的，只有一個一個具體的個人，而這些個人，就生活在我們身邊，我們一起上學、一起求職、一起投票、一起長大，看電影時在同一個點笑出聲，在同一片泥土上生、老、病而後多半死於斯土。我們為醫療保險制度和所得稅率辯論，我們為學校的教學制度和媒體的尺度問題爭吵，我們為行政和立法權的分際、為司法的公正與否斤斤計較，我們為哪個政黨該執政機關算盡、搏鬥到底，但是我們知道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在同一條船上」意味着波濤洶湧上只有同一個命運——當希臘這條船觸礁時，哪一個希臘人可以倖免？在同一條船上命運同體，這叫「同胞」。

可是，我們其實對自己的同胞很不認識，因為我們有太多的自以為是，太多的理所當然，我們很少真正地傾聽。那些存在的敘述界定了我們的想像區，使得我們習慣地而且往往極為固執地認為我們知道，其實我們不知道。很多人的記憶，因為不堪回首，因為難以啟齒，因為一言難盡，鎖進了封死的抽屜，所謂國史，通常就是有權力的人、敢大聲的人的敘述。

如果我們讓每一個同胞都打開記憶呢？如果我們讓每一個人都站出來說故事呢？國史，會不會很不一樣？我們很多原來得理不饒人的正義凜然，會不會多了一點謙卑，柔軟一些？

2013年「文化部」推出「台灣故事島」，上山下海地毯式地蒐錄庶民口述記憶，是一個「記憶解放運動」，鼓勵所有的子女牽着父

母、祖父母的手，去錄下一段自己的生命記憶。很多中年子女，坐在錄影機旁聆聽時目瞪口呆——相處一生，第一次聽見從來不曾聽過的事情。

如果談戰爭，浙江來的任世瑋會告訴你他初二時怎麼被老師騙上大船玩，上了船，船竟然開往台灣，他的一輩子就變成了兵。原住民胡秀蘭最記得的是小學同學被盟軍飛機炸死，死時高喊「萬歲」。宋建和會用客家話細細描述身為日軍的野戰倉庫管理員，他所目睹的「投降的那一天」台灣人的心情。黃廣海用濃厚的廣東國語為你平穩不火地說，他如何在坐了二十多年的政治監獄之後立志環遊世界。

開啓大傾聽的時代

二十世紀是一個倉皇的世紀，戰爭、貧窮、流離失所是那個世紀的最深刻的胎記。我們在戰爭中消滅同胞凌虐同胞，在貧窮中推擠同胞踐踏同胞，在流離失所中踩掉了別人的鞋子也來不及舔自己的傷口——我們自己還痛着，哪裡有心情去多看身邊的人一眼。

但是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了，離開戰爭的結束也七十年了，新一代人在前人血汗交織所種下的樹蔭中長大，現在是溫柔傾聽的時刻了。我們所欠的生命，賠不了。我們所欠的青春，回不來。可是，一個人的記憶就是他的尊嚴，我們欠他一個真誠的傾聽吧？二十一世紀的香港、台灣、中國大陸，應該開啟一個大傾聽的時代，傾聽自己身邊的人，傾聽大海對岸的人，傾聽我們不喜歡不贊成的人，傾聽前一個時代殘酷湮滅的記憶。

傾聽，是建立新的文明價值的第一個起點。

是的，記憶是一門非常、非常困難的功課，需要深刻的思索、智慧的抉擇，需要我們竭盡努力地去面對，去處理。



龍應台

